

# 毋𢆶《代茶饮序》考

张 铮

**摘要:**《代茶饮序》一文出自《大唐新语》,由于其对饮茶健康的重要指导意义,自《太平御览》始,后世文献中屡有引述,但在作者姓名和序文题目上多有讹误,这种状况,直至今日仍未有改善。本文通过对各版本《大唐新语》和相关类书的考察,确认该文作者是唐代目录学家毋𢆶。并通过对唐代“汤礼”习俗的研究,明确《代茶饮序》题目中“代茶饮”的真正含义。最后对《代茶饮序》原文观点进行辨析和拓展,得出更适用于今人饮茶健康的新观点。

**关键词:**《代茶饮序》;《大唐新语》;《太平御览》;毋𢆶;汤礼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20)05-0138-07

## Study of Wu Jiong's *Dai Cha Yin Xu* and Its Present Value

Zhang Zheng

**Abstract:** *Dai Cha Yin Xu* came from *Da Tang Xin Yu*.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 of drinking tea, it has been frequently quoted in later documents since *Taiping Yulan*, but there are many errors in the author's name and preface title. This situation has not been improved until toda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editions of *Da Tang Xin Yu* and related books,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as Wu Jiong, a bibliographer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ang Li" (ceremony of herbal deco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true meaning of "Dai Cha Yin" is clarified. Finally, it analyzes and expands the original viewpoints of *Dai Cha Yin Xu*, and draws a new viewpoint that is more suitable for people to drink tea healthily.

**Key words:** *Dai Cha Yin Xu*; *Da Tang Xin Yu*; *Taiping Yulan*; Wu Jiong; Tang Li

毋𢆶,唐代目录学家,开元十八学士之一<sup>[1]</sup>(P433-434),开元年间参与编纂《群书四部录》、撰修《六典》,后又编制《古今书录》四十卷,其目录学思想在《古今书录·序》<sup>[2]</sup>(卷四六《经籍志》, P1964-1965)中有较为详实的记述。虽然其生平事迹在史书中记述甚为简略,但由他撰写的一篇关于饮茶利弊的序文却借由《大唐新语》得以保存,全文如下(前有“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

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sup>[3]</sup>(卷十一, P16)在唐代这样一个饮茶之风大兴的时代背景下,此文却表达了一种辩证看待茶利与茶灾的观点,实属难能可贵。后世虽对此文屡有征引,却多有讹误。主要体现在引用该文时出现的作者姓名舛误和序文题目夺误两方面,本文将逐一进行考据。由于毋𢆶在《代茶饮序》中表达的观点对于今人饮茶

张铮,男,硕士,浙江科技学院信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茶文化研究。

健康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也将在文末着重对此观点进行辨析与拓展。

### 一、作者姓名舛误

由于该序文在各古籍中所引出处皆注《大唐新语》,所以先考察在该书各版本中的记载。需要指出的是,虽有学者对于《大唐新语》真伪以及所谓今本旧本存有疑义<sup>[4]</sup>(P22-29;P134-144),但本文暂不做区分,统一作《大唐新语》。另因“母”与“母”旧刻常混为一字,本文亦不做区分,统作“母”。

《稗海》本《大唐新语》卷十一《褒锡》有“右补阙母𣎵,博学,有著述才”<sup>[5]</sup>(卷十一),潘玄度本(以下简称“潘本”)此处亦作“母𣎵”<sup>[6]</sup>(卷十一),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处作“母𣎵”<sup>[7]</sup>(卷十一,P16),丛书集成初编本作“母𣎵”<sup>[8]</sup>(卷十一,P118)。由于后二者皆以《稗海》本为底本,且中华书局本又以潘本为校本,可见,“𣎵”字有误,但“𣎵”“𣎵”该如何取舍?考两唐书中记载其生平事迹皆作“母𣎵”<sup>①</sup>,可知是“𣎵”字无疑(中华本“𣎵”字或为重排印误)。陈垣先生亦云“𣎵即撰古今书录之人”<sup>[1]</sup>(P433-434)。值得提出的是,在以上四本《大唐新语》卷九中皆载有母𣎵在张说组织下撰修《六典》一事,并同误作“母𣎵”<sup>②</sup>,查阅《新唐书》《直斋书录解題》<sup>③</sup>对照,不难得知此乃刻误。

但“𣎵”何以讹为“𣎵”,仍需进一步考察。《集韵》卷六有“𣎵,𣎵,火名,一曰日光,古作𣎵”<sup>[9]</sup>(卷六《上声》,P122)。又《历代名画记》卷九载开元十一年法明为含象亭诸学士(含“母𣎵”)写貌一事<sup>[10]</sup>(卷九,P283)。又《元和姓纂》卷二母姓“开元右补阙母𣎵,洛阳人”,岑仲勉校云“考‘𣎵’为‘𣎵’之古文”<sup>[11]</sup>(P247-248)。由此可知,“𣎵”乃误自“𣎵”。

因明刻本《大唐新语》中舛误较多,下面再从年代较早的类书中加以佐证。

《太平御览》(后文简称《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引《代茶饮序》“唐新语曰右补阙母景”<sup>[12]</sup>(卷八六七《饮食部·茗》,P3845),《太平广记》(后文简称《广记》)卷一四三同引作“唐右补阙母𣎵……出大唐新语”<sup>[13]</sup>(卷一四三《母𣎵》,P1028),另《侯鯖录》东坡论茶篇有“大唐新语曰,右补阙母景”<sup>[14]</sup>(卷四《东坡论茶》)。《广记》此处“作‘𣎵’亦误”。“‘𣎵’,……音‘憬’<sup>④</sup>,故《通志》转作‘景’”<sup>[11]</sup>(P247-248)。原因在于宋人避太宗讳改<sup>[15]</sup>

(《淳熙重修文书式》)。考察《御览》卷四〇〇人事部又有“唐新语曰母𣎵(俱永切)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𣎵梦着衣冠上北邙山”<sup>[12]</sup>(卷四〇〇《人事部·凶梦》,P1849)(此处应是避讳未尽)。经比对发现《御览》中上述两卷出现的两条内容之和恰与《广记》中“母𣎵”条目下的完整内容一致,由此可知,当是“母𣎵”无疑。

另有“母照”<sup>[16]</sup>(P1869;卷五一)亦为避讳。屠隆《考槃余事》更是讹作“唐武𣎵,博学,有著述才”<sup>[17]</sup>(卷四),概“母”和“武”,“照”和“𣎵”谐音之故。需要指出的是《天中记》屠隆校本卷四十四《茶》有“茶利茶灾:右补阙母𣎵,博学,有著述才”<sup>[18]</sup>,而非“武𣎵”,此处不免让人怀疑《考槃余事》为托名之作<sup>[19]</sup>(P66-71)。但仔细考察可发现该卷卷首有“男龙光校”字样,而非第一卷卷首之“四明屠隆纬贞甫校”。原因是六十卷本《天中记》屠隆仅校其中五十卷(卷一至卷四〇,卷五十一至卷六〇),而中间十卷(含卷四十四,记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内容)并非其所校<sup>[20]</sup>(P112-120),是故“武𣎵”恐不能作为《考槃余事》伪作之旁证。

至于“𣎵母𣎵”之讹,乃是误用劣本所致<sup>[21]</sup>(P81-83),此处不再赘述。仅提一点,“母”增作“𣎵母”至少在明代已经出现<sup>[22]</sup>(卷十六《茶夹铭》;利部《茶谱》),四库本并非其源头。

### 二、序文题目夺误

相较作者姓名,序文题目之误可清晰地分成以下四种:“代茶饮序”,“茶饮序”,“代茶余序”和“伐茶余序”。

仍旧先考察《大唐新语》,除四库本《唐新语》作“代茶录序”<sup>[23]</sup>(卷十一,P382)外,其余皆作“代茶余序”。前文已提四库本《唐新语》为劣本,且孤证不立,故“代茶录序”不做考量。另《全唐文》卷三七三“母𣎵”著述中有“代茶余序略”<sup>[24]</sup>(卷三七三《母𣎵》,P3792),上文提到的《天中记》中亦采用“代茶余序”<sup>[18]</sup>。综上可知,凡用“代茶余序”者皆为明清之作,《大唐新语》虽唐人所著,但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版本(如《稗海》本、潘本)皆为明刻本,加之该书文字讹误之处较多,且“代茶余序”所谓何意,颇难理解,故此说不足采信。

“伐茶饮序”三例:其一见《群芳谱》利部《茶

谱》;其二见《广群芳谱》卷十八《茶谱一》,此条直接引用《群芳谱》原文,仅将“綦毋旻”改为“綦毋晃”;其三见《续茶经》卷下“七之事”<sup>[25]</sup>(利部《茶谱》;卷十八《茶谱》, P439;卷下《七之事》)。三书皆明清之作。又查成书年代早于《群芳谱》的《李温陵集》中有《茶夹铭》一文,文中有“唐右补阙綦毋旻著代茶饮序”<sup>[22]</sup>(卷十六《茶夹铭》),由此“代”比“伐”更可信。另《续茶经》此条乃引自《侯靖录》,然考察后者可知原文中所载为“茶饮序”<sup>[14]</sup>(卷四《东坡论茶》),之前并无“伐”字。综上可知,“伐茶饮序”亦不足信。

“茶饮序”五例:其一见上文中的《侯靖录》;其二见《事类赋注》卷十七《茶》“岂瘠气而侵精”条;其三为《玉海》卷一八一“毋景著茶饮序”;其四见《证类本草》卷十三引《本草图经》“故唐毋景茶饮序云”;其五见《本草纲目》果部卷三十二《茗》,原作“茶序”,校者认为“代”和“饮”皆脱,故增补<sup>[26]</sup>(卷十七《饮食·茶》, P350;卷一八一;卷十三《木部中品·茗》, P325;卷三二《果部·茗》, P1873)。以上五种成书年代皆在《御览》《广记》之后,因此应以此二书勘校。

《御览》卷八六七“茗”作“代茶饮序”<sup>[12]</sup>(卷八六七《饮食部·茗》, P3845),《广记》卷一四三“毋旻”作“代茶饮序”<sup>[13]</sup>(卷一四三《毋旻》, P1028)。虽后者存在文字颠倒之误,但若仅考察“代”字之有无,则结论是很清楚的。此序文当作“代茶饮序”无疑。

下面再从“代茶饮”之含义来阐释为何以此为序名。唐《新修本草》卷九“地榆”有“用叶做饮代茶,甚解热”<sup>[27]</sup>(草部中品卷九, P230)。《外台秘要》卷三十一“古今诸家酒一十二首并代茶饮列于下”中记有一“代茶新饮方”,以“黄芪”等十四味药材合而制饼、捣末,“煎以代茶”,有“补腰脚”之效,“禅居高士特宜多饮”<sup>[28]</sup>(卷三一, P852, 856-857)。《增修诗话总龟》卷七“王焘集《外台秘要》有‘代茶饮’一首,云:‘格韵高绝,唯山居野人乃当作之。’吾尝依法制,服之利膈调中,信如所云。而其气味,乃一服煮散耳,与茶了无干涉”<sup>[29]</sup>(卷七, P43)。阮阅可谓一语中的,“代茶饮”其实就是一种类似“煮散”剂型的日常保健饮料<sup>[30]</sup>(P42-45)。宋代“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sup>[31]</sup>(卷一, P275)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存在,这里所说的“汤”在唐代多称“(汤)药”,唐代茶药并重,服食汤药的习俗乃是六朝时期养生服食的延

续,唐人常饮的数种汤药中即包含黄芪汤<sup>[32]</sup>(P331-367)。《广记》卷二一言孙思邈“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以茶法煎来”<sup>[13]</sup>(卷二一《孙思邈》, 143),此处“汤末”亦是“煮散”。严格地讲,“汤剂”和“散剂”并非同一剂型,南北朝时期,汤剂的加工由捣粗颗粒转变为切片,而散剂仍是捣碎、连末同煮<sup>[33]</sup>(P585-587)。上文提到的“代茶新饮方”中“捣末,……煎以代茶”以及《广记》“汤末,……以茶法煎来”,从加工工艺以及煎点方式上来看,实为“煮散”,但在命名时“煮散”往往仍沿用汤名。由此看来,毋旻作“代茶饮序”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且文题相合。

### 三、序文观点辨析与拓展

下面回到序文本身,来阐释其价值。“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共三句话:第一句阐述茶之效力——有利有弊;第二句描述饮茶人对饮茶的态度——只注重茶利;第三句揭示上述态度的成因——福近易知祸远难见。

毋旻对茶之利害的阐述是很客观的,这其实也反映了唐人对茶叶功效的了解较前代更进一步。郭璞注《尔雅》卷下释草第十三“荼,苦菜”,注:“诗曰,谁谓荼苦。苦菜可食。”释木第十四“檟,苦茶”注:“树小似梔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生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sup>[34]</sup>(卷下)可见郭璞对于苦菜与茶各自的草木属性是清楚的。但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七菜部上品“苦菜”注“疑此则是今茗”,虽首次在本草经中引入茗,但却没有独立成条,而是并入“苦菜”之中,可能在他看来如此优异而且广为饮用的茶<sup>[35]</sup>(P102)不可能在旧本《神农本草经》中缺席,且茶被其视为上品。唐初《新修本草》中对此做了修正,菜部卷第十八“苦菜”注:“苦菜,……陶谓之茗,茗乃木类,殊非菜流。茗,春采为苦茶。茶,音迟遐反,非途音也。……二物全别,不得为例。”又木部中品卷第十三“茗、苦茶。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瘰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采之。苦茶,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sup>[27]</sup>(菜部卷十八, P459-460;木部中品卷十三, P334-



<sup>335)</sup>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新修本草》对茶的归属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区分茶和苦菜,确定茶属木本;二是将茶单独成目;三是把茶从上品降为中品。而且品级的变化尤为重要,这反映了唐人对茶的认识不只是生物学上的进步,更是药物学上的发展。“上药一百廿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廿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廿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sup>[36]</sup>(卷一《序录》,17)其中上品药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和中品药物“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以明确唐初之人对于茶之效力的理解。

李肇《唐国史补》卷中“灞沪中浸黄”篇有“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热黄,……近代悉无,而患腰脚者众耳。疑其茶为之也”<sup>[37]</sup>(卷中,147)。而元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三“书云,饮酒醉未醒,大渴,饮冷水又饮茶,被酒引入肾脏,为停毒之水。腰脚重坠,膀胱冷痛,兼患水肿、消渴、挛痹”<sup>[38]</sup>(卷三,1543)。对唐人的疑虑做了很好的注解。

晚唐诗人薛能在其诗《蜀州郑史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中道“盐损添常减,姜宜著更夸”<sup>[39]</sup>(卷五六〇,16494),后句恰与《新修本草》中“苦茶,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一致。而前句的认知就更进一步,《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二卷“茗”有“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sup>[26]</sup>(《本草纲目》,卷三二《果部·茗》,1873)

可见随着饮茶之风的流布,唐代对于茶效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这为母嬰提出其观点提供了条件。如果单纯针对茶的药物效用,“释滞消壅”、“瘠气侵精”的描述是很全面很准确的。所以母嬰接下去用“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谓茶灾”来描述当时的饮茶之人对于茶的态度,即只褒不贬,而不能辩证对待。继而引出“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的结论,以解释上述现象的成因。如果把母嬰的观点单纯放置在茶的药物效用这一范畴内来看,其论证并无不妥,甚至有些超越时代,特别对今人饮茶也有警示作用。但这里面

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如果饮茶之人单单是为了取得“释滞消壅”的药物功效的话,那么当一个人通过饮茶获得了“下气、消食”的“近福”之后,自然可以毫不留恋地停止继续饮茶,又何至于对“远祸”视而不见呢?这说明,饮茶人对茶的依赖并不完全是源于其药物功效,而是有更深层的、更长久的、却更不容易被察觉的需求——社交的需求(无论饮茶人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正是源于人对社交的需求,使得茶能够由药用逐渐转变为饮用并最终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嗜好品。且一旦成为嗜好品,茶便更能与社交圆满、社会承认联系起来<sup>⑤</sup>。

李时珍在指出“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民生日用,蹈其弊者,往往皆是,而妇姬受害更多”的同时,揭露了其根源在于“习俗移人,自不觉尔”。对于“人有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嚼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无奈感叹道“抱病不悔,尤可叹惋”<sup>[26]</sup>(《本草纲目》,卷三二《果部·茗》,1873)。他认为嗜茶成癖者虽抱病尤不悔,乃是由于习俗移人,自不觉尔,这确实是多数人的情况。但还有一种人,自知茶性清苦寒凉,却依然咀嚼不止。李贽《茶夹铭》中表达了对母嬰观点的驳斥,称之为“恕己责人之论”,其后又言“我老无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饮,不辩几钟;每夕子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愿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sup>[22]</sup>(《卷十六《茶夹铭》》)。其中“我老无朋”生动地刻画了他当时的境遇,我们显然不能苛责李贽福近易知、祸远难见,因为他眼中的福祸早已超越常人。但另一方面,“朝夕唯汝”也反映出即使特立独行如李贽者,实际上仍旧不能摆脱人作为类存在物(species-being)的社交需求,或者说其特立独行本身即是一种社交需求。因为“在其他一切自顾自的动物那里,每个个体都实现着它的整个规定性。但在人那里,只有类才可能是这样”<sup>[40]</sup>(P263)。

之所以会有“抱病不悔”者,是“因为精神能使感官遭受败坏,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要求”<sup>[41]</sup>(P83)(无论其本人能否意识到这一点)。“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

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sup>[42](P162)</sup>。这也就是卢梭所认为的人区别于禽兽的特质——“自我完善化的能力”<sup>[41](P83)</sup>。由于这种能力必须要在类当中实现,也就必须得到社交的满足。

“天然的自由以个人的力量为界限,社会的自由使个人能借助所有人的力量,使其享有的更多”<sup>[43](P62)</sup>,即人脱离蒙昧而进入理性。但人在社会中进行生命活动时并不能时时表现出这种理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卢梭本人时常也是矛盾的。而这也正是今人饮茶必须引起警惕的。比如,康德就认为,“人有一种自然倾向——比较和模仿某个更重要人物的行为举止方式,目的在于显示不比别人更卑微,甚至取得别人的青睐,这种模仿的法则就叫时髦。”<sup>[40](P156)</sup>以下两则故事说明问题。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出《启颜录》)”<sup>[13](卷二四七《魏市人》, P1912)</sup>。

“安少有盛名,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价增数倍”<sup>[44](卷七十九《谢安传》, P2076)</sup>。

若以同样心态来饮茶,就很有可能陷入“自不觉尔”“抱病不悔”的境地。特别的,同其他嗜好品一样,茶吸引人的方式也在于“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注意力唤醒过来。人的这种自我消遣的方式代替着某种社交的作用,因为它不通过谈话,而通过总是被重新激发起来的感觉,和转瞬即逝但又时时更新的刺激,来填补时间的空闲”<sup>[40](P45)</sup>(无论是否有他者在场)。这也是为何18世纪欧洲宫廷对咖啡的需求快速流行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在于咖啡(效用)本身,而是在于咖啡饮用过程中有机会体现饮者的优雅和精致。其消费过

程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礼仪。简言之,形式取代内容<sup>[45](P19)</sup>。但精神上的获得,往往以身体代价作为补偿。

古今对比,今人饮茶更易因“自不觉尔”导致“尤抱病不悔”,下试述三种原因,以警同好。

其一,“患腰脚者众耳”“自茗饮盛后,人多患气”<sup>[46](卷七十三《漱茶说》, P2370)</sup>的情况发生在“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的唐宋,汤礼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茶饮之弊,如无名氏《南窗记谈》,就将汤礼的成因解释为“盖客坐既久,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前人之意必出于此,不足为嫌也”<sup>[47](P243)</sup>。意即汤可补气。而上文中提到的“代茶新饮方”也有“补腰脚”的功效。但宋代以后世俗中汤礼逐渐没落,如今日常更是不复存在,今人饮茶自当更加谨慎。

其二,互联网、移动通信、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的发展,产生了新形式的空间生产和新的景观社会——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构建了新形式的消费社会,人在不自觉中通过自己的生产来影响他人的消费,又通过消费来划定自己的阶层。“该不该饮茶”“该饮何茶”“如何饮茶”,诸如此类,往往是被“生产”出来的,而非饮茶者真实之需要。

其三,关于喝茶功效的科学研究不同于日常饮茶。茶的功效研究以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为主,通过观察相应的茶提取物对动物们的影响来检验该成分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人不是动物;其次摄入方式和剂量不同;再次日常饮茶不是茶叶(单一)提取物饮用。工具理性往往以某种十分精妙的方式被塑造成价值理性的模样,从而左右饮茶者(但不仅限于饮茶者)的判断,结果往往实现了资本的增殖(有意或无意的),而不是饮茶健康。

#### 注释:

①关于毋斐编纂《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一事,散见于中华书局1975年版《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页1962和卷一〇二《元行冲传》,页3163、317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九九《马怀素传》,中华书局,1975,页5681。

②此误详见上文所提四本《大唐新语》卷九《著述》。

③关于母嬰参与修《六典》一事,见中华书局1975年版《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页147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六《职官类》,商务印书馆,1939,页166。

④“憬(俱永切)”古音与“嬰”同。见《集韵》卷六《上声》,页122。

⑤关于茶如何由药用转变为饮用以及茶如何成为嗜好品等内容,在关剑平先生所著《茶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有着非常详实的论述。

### [参考文献]

- [1](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唐)王肃,许德南,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M].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杨光皎.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
- [5](唐)王肃.大唐新语[M].(《稗海》明万历商濬刻本)中华古籍资源库,善本书号02952.
- [6](唐)王肃.唐世说新语[M].(明万历三十一年潘玄度刻本)中华古籍资源库,善本书号11767.
- [7](唐)王肃著,许德南,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M].(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唐)王肃.大唐新语[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
- [9](宋)丁度.集韵[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
- [11](唐)林宝.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4](宋)赵令畤.侯鯖录[M].(明嘉靖二十三年芸窗书院本)中华古籍资源库,善本书号02525.
- [15](宋)丁度.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M].(丛书集成续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
- [16](宋)王钦若,等.宋本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9;(宋)王应麟.玉海[M].(庆元路元至元六年刊本)中华古籍资源库,善本书号A00915.
- [17](明)屠隆.考槃余事[M].(《尚白斋镌陈眉公订正秘笈》,明万历三十四年秀水沈氏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 [18](明)陈耀文,编.屠隆,校.天中记[M].(明万历二十三年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 [19]黄睿,秦跃宇.《考槃余事》作者考辨[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
- [20]沈秋燕.《天中记》版本源流新考[J].图书馆杂志,2019,38(6).
- [21]李不言.“恭母嬰”之子虚乌有与电子文献的使用[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3).
- [22](明)李贽.李温陵集[M].(明刻本)中华古籍资源库,善本书号16684;(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M].(明沙村草堂刊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 [23](唐)王肃.唐新语[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24](清)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5]二如亭群芳谱;(清)刘灏,等.广群芳谱[M].(《国学基本丛书》)商务印书馆,1935;(清)陆廷灿.续茶经[M].(《原本茶经》,陆氏寿椿堂清雍正十三年刊本)中华古籍资源库,善本书号13626.
- [26](宋)吴淑.事类赋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9;玉海;(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7;(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 [27](唐)苏敬撰.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 [28](唐)王焘.外台秘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
- [29](宋)阮阅.增修诗话总龟[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30]苏诺,郑金生.宋代“茶汤”兴衰考辨[J].中医药文化,2009,(1).
- [31](宋)朱彧.萍洲可谈[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32]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J].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33]袁冰,石东平,宋廷青.略论宋代的煮散[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10).
- [34](晋)郭璞,注.尔雅[M].(宋监本《天禄琳琅丛书》)商务印书馆,1931.
- [35]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36](梁)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37](唐)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38](元)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M].(《道藏》18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
- [39](唐)薛能.蜀州郑史君寄乌觜茶,因以赠答八韵[A].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0]康德.实用人类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 [41]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4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3]尚杰.社会契约论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 [44](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5]Wolfgang 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 [4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7]无名氏.南窗记谈[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施由明

## 《农业考古》订刊购刊公告

《农业考古》为国内外发行的双月刊,双月的28日出刊。其中第1、3、4、6期为农业考古及相关农业历史研究,第2、5期为茶文化专号。每期订价为25元。欲订购该刊,可从银行转账到下列账号,然后发邮件至agarsym@126.com 告知订或购期数及数量,以及收刊人的邮编和邮递上门的确切地址。若需开具发票,请在邮件中告知发票抬头及税务识别号(法人证书号)。

### 《农业考古》账户:

户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农业考古》编辑部

账号:106899000000028560

开户行:南昌农商银行湖滨支行

行号:402421099990